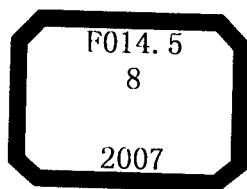


后物欲时代的 来临

郑也夫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郑也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 郑也夫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978 - 7 - 208 - 06591 - 8

I. 后... II. 郑... III. 消费经济学 IV. F0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5111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划编辑 储卉娟

责任编辑 储卉娟



世纪文景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郑也夫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166,000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6591 - 8/C · 246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快乐哲学批判与人性之再认识	6
第二章 消费：解释、批判与辩护	19
第三章 广告	34
第四章 消费的门槛	49
第五章 商人的操控	64
第六章 物质崇拜与身份证明	80
第七章 非物质化与虚拟空间	95
第八章 时尚	114
第九章 收入、消费与幸福	130
第十章 消费、工作与休闲	143
第十一章 贵族文化与大众文化	156
第十二章 走向游戏的时代	168
参考书目	184
主题索引	189
人名索引	193

序 言

这是一本努力解释消费的理论著作。解释和批判是两种不同的智力活动。批判意在阐述被批判者如何不对。辩护正好相反，要论说它没什么不对的。解释不同于批判，也不同于辩护，重点探讨该对象如何运转，如何定型，对错之判断还在其次。笔者虽然在本书中取向解释，但在长期生活中早就形成了对待消费的批判态度。任凭怎样努力，在着手解释的时候，批判态度殊难避免。于是解释和批判相撞。不是我想熔于一炉，这里更想做的是解释，二者熔于一炉却是实际上发生的。解释和批判是什么关系呢？解释通常无伤批判，甚至还可以使批判更具力度。当然如果解释过于学究气，将妨碍其批判檄文的流传范围。批判的态度似乎更有可能伤害解释，批判往往比解释偏激，偏激的风格因为满足了俗人追求刺激的需求，常常有助于批判话语的传播，但偏激极易走向片面，而这是解释之大忌。但应该说此种伤害也非必然。一方面，企图没心没肺、没脾气、没意见地进入一个是非之地——如果全无是非为什么还要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活一口气，佛受一炷香”嘛。“进场”是需要动力的。动力不是必然与某种情绪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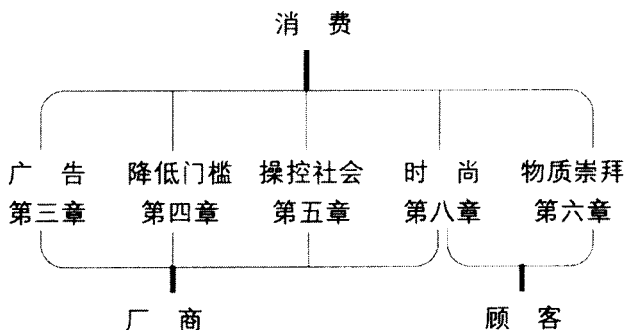
智力上的兴趣也是动因，但是动力往往离不开情绪。另一方面，既然“来者不善”，研究者事先就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态度和气性，或批判或辩护，所谓“价值中立”便只能取决于入局后，而非入局前。这也正是韦伯的意思。我以为，解释的中立依赖于三项素质。其一，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不弱于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其二，意识到批判的锋芒会毁伤解释，入局后善于角色转换，自觉约束成见。其三，具有高超的理性能力。我自忖热爱智力生活。意识也有，自束的程度就不敢说了。至于理性能力如何，乃至我的批判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毁伤了本书中的解释，自己更没有发言权，只好由别人判断。

本书第一章重点在指出问题。应该说，生活在今天社会中的几代人堪称“躬逢盛饯”，我们遭遇的既有旧时代的难题，也有新时代的困惑。两重问题其实都是费解难缠的。旧时代的问题依然存在：在物质的层面仍然有大面积的贫困人口；在制度和文化的层面上，蜕变远未完成，路径匪夷所思。其结局大约不会给叛逆者们留下多少颜面，我们最终享受不到破解那些问题的荣耀。因为那些问题大约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戏剧性地终结，极可能是随着新问题层出不穷，以及新生代对旧问题的冷淡与麻木而销蚀和解构。历史的吝啬与吊诡，可见一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列车行进太快，上轮牌局中一方已露颓势，一桌新开张的牌局却将全体新人和半数老者吸引。当然也还有不舍旧牌局之胜负者。我算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步入新局，不识时务处在于：任凭对象更换，批判本性不改。新时代同样问题丛生，其中最大者，我以为是合二而一的这样一对问题。一方面，温饱即将全面解决，这在生物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空虚、无聊必然发生。另一方面，物质的供应仍以加速度、疯狂地推进，乃至商人成了最强的社会势力，消费成了最大的社会运动，追求快乐成了与之配套的、俘获众多男女的生活哲学。但是它没有解决，相反却造就出新时代的最大问题和荒诞，即本书的主题：所谓消费。本章还批判了快乐哲学，并阐述了我关于人类三种追求的理论：舒适、牛逼、刺激。

第二章主要是简述消费的演进，简介对消费的两大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消费是厂商造就的。第二种解释认为，消费者的积极参与是消费产生和

继续的基础，其动机是炫耀自己、证明身份。这一章中还简介了对消费批判与辩护的主要观点。

在以上两章的基础上，笔者开始建立本书的解释系统，其基础是对消费机制的解释。消费机制由五种行为或心理构成：广告，降低消费门槛，商人通过买通官员和专家而操控社会，人们物质崇拜的心理，时尚。先后有五章分别讨论它们。这是本书的“中段”。下面的图形可以直观地显示这一解释系统的结构：



广告、降低消费门槛、买通官员和专家，三者均为厂商的行为。广告造就了消费世界的影响和氛围。买通官员和专家消除了对倾销某一商品的社会制衡。降低门槛消除了消费者的价格约束。这三个手段中，降低门槛是最正当的，尽管其社会效果也并非单向。物质崇拜是人类，当然也是普通消费者的心理，它的流行版本就是以物品证明身份。时尚是商人打造的“候选”中蒙受大众青睐的商品、风格、消费方式，因此可以说它是厂商和顾客的“共谋”。以上五者，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消费机制。

第七章讨论的完全不是消费机制中的成分，而是现今社会中已经和即将出现的趋势，笔者预计它是“后消费时代”中人们生活的主要构成。这一章所以插入到消费机制的五个章节中，主要是因为它同第六章有过于紧密的逻辑关系，兼及还可以为第八章论及的时尚之非物质化做些铺垫。于是原本严谨的消费机制的论述中打进了一支楔子。这一章的“非物质化”讨论，从物质消费的一大功能——满足人们的炫耀心理上，质疑其可持续性。

第九章继续第七章的怀疑逻辑，分析消费、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第十章是在质疑工业时代中与消费观互为表里的工作观，深入阐述自凯恩斯以来不断光大的一个观点：生产问题解决了，工作将不是未来生活中的最主要内容。失业和半失业将成为未来社会中多数人的常态。

第十一章指出，近现代教育是服务于生产，教人们如何工作的，而古典教育是服务于贵族，教他们过艺术化的生活。因为全民即将如古代贵族一般解决温饱，因为工作的重要性丧失，未来的教育显然要融合生产本领和生活艺术。

第十二章论述了，温饱解决后，物质不再是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

当年绝对想不到，因为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自己最终沦为扶手椅上的学者。多年来已经极少做实地与田野调查。进入大学后，写作同教学结下姻缘。我近年的多部著作——《信任论》、《城市社会学》、《都市的角落》（编）、《阅读生物学札记》都是在教学相长中完成。从2002年开始教授“消费与快乐研究”课程。讲过两轮后，对消费和快乐的阅读积累不断增长，愈感一门课程包容不下两大主题。于是送走“快乐”，专侍“消费”。这门课从2002年讲至2005年底，从人大到北大，从北京到深圳，先后讲了六轮，这在我来说是破纪录的。我的课程一般讲满三轮，就完稿成书，该课就此罢休，转而准备新课。这次的延宕，有中途患眼疾的原因，还有智力过程中一些说不清的东西，令我总感不充实、不饱满，达不到执笔的状态。

我的写作动机从来都是源自个人生存中的感受，生存之地自然是本土。可是一个一直令我惭愧的事实，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更强烈感觉到，即我的著作中来自本土的材料总是很少。我阅读的理论著述基本上是洋人的著作或译本，引用的本土经验调查也很少。我知道，一个面向本土而又不亲自搞调查的社会学理论家应该高度重视和借鉴本土的经验研究，但是我找不到关于本土消费问题的优秀的经验研究成果。这么想，不是说我想贴上“本土”的标签。一个从来不在意冠冕的人，会自插标签吗？我真的以为，没有本土的经验研究作基础，我的理论思考是难于深入的。我的研究的初衷和出发点是本

土，舍此竟甚少本土的东西。

上面说到，我的写作和授课是同步进行的。我的课程要求，选课者围绕中国社会中某个消费现象写一篇文章，且必须以经验调查为基础。六轮课讲下来，我的写作完工。与此同时，选修这门课程的同学们的优秀文章也集腋成裘，冠名为“消费的秘密”。与这本书成姊妹篇，将一同出版。它们或可安慰我远离经验研究后不无遗憾的心境。

本书稿付梓前的读者均为我现在和昔日的学生。北大深圳研究生分院的学生阅读了本书的九章。我过去的学生、现在的朋友陈心想、田方萌、高永平、郭茂灿，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意见。戴碧漪帮助制作了本书中的全部图示。一并致谢。

郑也夫

丙戌年元月

海淀板井村寓所

第一章

快乐哲学批判与人性之再认识

一、人生观权威制定者的淡出

我们生活的目标，简而言之我们的人生观，是谁提供的？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都曾经是人生观的权威制定者。尽管在西方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宗教的权威一直在与政治权威分庭抗礼，与政治家争夺人生观的话语权。但是中世纪东西方的这一点点差别不是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我们当下要谈论的是，在近现代的世界里，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们都先后从为人们提供人生观的这种角色中淡出，其殊途同归的原因是什么？

这淡出在西方社会中昭然若揭。1972年美国社会学家埃文在其著作《意识的首领》中自问自答：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谁是意识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无冕之王——新闻记者们；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它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而是商人（Ewen, 1976）。1984年日本作家山崎正和这样描述20世纪70年代

的日本社会：

国家对于国民已经不是有趣的存在。她已不是给日常生活带来刺激，而激励个人人生的存在。她不再是为大目的而行动的战斗集团，她已转化为抱持无数的小课题、而谋求期间微调的日常性技术集团。换言之，国家已经不是祭典的场所，而已化为务实的世界。（山崎正和，1984：28）

对这一描述，今日的中国读者应有似曾相识之感。步西方与日本之后，我们的政府在近十余年间也正在从一个“为大目的行动的战斗集团”变为“日常性技术集团”。

而中国社会中这一变换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在第四届人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它代表了中国一些高层政治家的含蓄的语码转换，将重心从阶级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人类，转移到生产和生活上。周恩来的这份政治遗嘱给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为日后的改革做了铺垫。但是这位务实的政治家始料不及的是——他举起的是一把双刃剑。剑的一边指向的是悖离心心的政治乌托邦，而剑的另一边——他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立场——也为自身社会角色的淡出埋下了伏笔。毕竟，它们是因为一种政治理想主义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要强调物质吗？要讲生产和生活吗？那就有更胜任的角色——商人。要政治家来鼓吹物质主义，鼓吹好生活，只能是大而化之。只有商人才可以具体而微、活灵活现地展示好生活。他们可以告诉你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告诉你“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所以说，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最终垄断者。

政治转向始料不及的后果，是中国政治家从制定人生观的角色中淡出，并被商人取代的直接原因，但也只是浅层原因。它下面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正是这一深层原因导致了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东西方政治家统统从人生观制定者的角色中淡出。深层原因就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发生了一个从古至今整个一部人类进化史上都不曾发生过的变化。李鸿章在19世纪中

叶说：我们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套用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说，人类眼下遭遇的是二百万年未有之变局。

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北部世界，接着也开始降临在南部世界。什么变化？就是温饱大体解决了，温饱在北方的世界已经基本解决，在南部世界也开始解决。这事今天说起来很轻松，却是亘古未有。从20世纪中叶往前推，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历史。人类各个民族曾经提出过的几乎所有的主导人生观，都是建立在人类历史的这一基调之上的，都折射出此种生存状况的基本氛围：生存是严酷而艰难的。

以中国古代的先哲提出的人生观为例。孔子说：“君子居无求安，食无求饱。”（《论语·学而篇》）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章句下》）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孟子·告子章句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成语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俗话说：“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这一句句箴言都离不开劳、苦、艰难、忧患。社会中不是还有一些贵族吗？这些贵族不是置身于苦难之外吗？不是养尊处优吗？但是这些贵族毕竟也笼罩在大的社会背景之下。这大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就是人类陷入严酷的生存挣扎之中。少数的贵族不能豁免于这样的氛围，不能置身其外，何况他还要勉励他的下属和庶民们。所以每个社会拿出来的统统是这样的人生观。

但是今天这样的生活状况不存在了，或是即将不存在了，生活不再那么艰苦了，温饱解决了。还能拿过去的那种人生观来教育众生们吗？你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新生代们出生伊始生活就不艰难，他们问：为什么要艰难困苦呢？这不是陷入了悖论吗：人们通过艰苦的努力以及他所创造的生产力的进步，使他渐渐脱离饥寒和苦难，而我们却又要说：苦难才是他成长和成功的基本条件，这不等于说，他的成功将使他自已堕落和失败。西方大文豪萧伯纳说过这么样一句耐人琢磨的话：

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你心里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

到了。(萧伯纳, 1902: 220)^[1]

当温饱猛然解决的时候, 当最初的满足过后, 我们会忽然觉得空虚无聊, 我们会不知所措。这种不知所措, 这种温饱解决后带来的空虚, 曾经率先降临在社会中的少数贵族的头上, 导致了其中的一些人腐败堕落, 但无伤大体, 因为只是少数人中的一部分。而现在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 是人类几百万年来头一次全体成员的温饱问题大致解决了。我们以往建立在温饱未解决之上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不是将被掀桌子、卷地毯、全军覆没吗?

我以为这正是以往的人生观制定者面临最严酷挑战的深层原因。亘古未有的社会变迁令他们失语。

怎样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 成了一大问题。当代社会中的两股力量在力争填补这个空白。一股力量就是商人, 商人们一方面在推动消费, 另一方面在营造以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但是后一种工作, 光靠商人是不行的, 商人充其量只能创造出新的促销手段。后一个工作还需要理论家出场, 为这一工作奠定基础的是提出了快乐哲学的理论家们。

二、快乐哲学批判

什么是快乐哲学? 快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 人的行为的——每个人基本无例外——主要动机是追求快乐。他们学说的第二项内容是讨论如何去追求快乐。在探讨如何去追求快乐的时候, 我和汉语世界中较早开始讨论快乐的经济学家黄有光享有一些共识。他是经济学家中的少数派, 他认为不是有钱就一定快乐, 不是一切经济举措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即使是经济学

[1] 萧伯纳的这句话被无数研究消费或快乐的学者引用。有时说明了这是萧翁的话, 但未注出处, 更多的时候干脆不提萧翁。乃至在我找到这句话来源之前, 不敢确定其创作权的归属。且有时这句话被变形为: “人的最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 人的第二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如此轻易就解决了。”当然这样更符合消费研究者的想法。其实萧伯纳这一剧本《人与超人》结尾的一句话也生动且契合我们的思想: “安(剧中女主人公)看起来很幸福, 但她只不过是胜利了, 成功了, 达到了目的了而已。那并不是幸福, 不过是强者出卖幸福的代价。”

中的少数派，还是认为大前提是毋庸置疑的，即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快乐（当然经济学家中也还有真正的异端，比如罗伯特·弗兰克，笔者与他们高度共识）。在这点上我与黄有光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更准确地说，我认为，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命题不是自明之理。自明之理是不用证明的，只要是脑筋没有问题的人就不会产生疑问。那么我脑筋尚无毛病，却对此存有疑问，应该说明这不是自明之理。未经证明就视为坚实的前提，这叫什么逻辑？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呢？一个神志清醒的侏儒反对，就足以证明它不是自明之理，何况人类所享有的三大思想资源，统统不支持这个论断。

第一大资源就是人类的宗教遗产，那是最古老的、曾经覆盖了最多的受众的思想资源。它们几乎统统地不支持这个命题——人生就是追求快乐。

第二大思想资源——传统道德。各个民族的传统道德鲜有公然鼓吹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的。中国的传统道德我们前面已经说到，显然不支持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的。

我们所享有的第三大思想资源是什么？是进化论的思想。进化论阐述了生命的进化，人类的产生。但是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最有解释力的近代思潮，也不支持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说法。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适者生存。什么叫适者？就是生存和繁衍上的成功者，而前者仍然是为后者服务的，“适者”说到根本就是繁衍上的成功者。如果一个物种，或者其中一些成员，过度地沉溺在快乐追求当中，很有可能不利于它自己的生存和繁衍，乃至很可能被淘汰出局。如果某一种行为不利于生存和繁衍，该行为将随着其载体被淘汰而消亡。相反，“适者”在生存过程中要承受很多不可推卸的苦难。

现代进化论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乔治·威廉斯在其和尼斯共同写作的著作中说：

自然选择没有使人快乐的意图，而我们基因的远期利益常常是要由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来保护的。（尼斯 & 威廉斯，1994：87）

他们举出了孕妇妊娠早期的恶心呕吐为例。“这使得快要做妈妈的妻子难

过、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是有着积极功能的。“妊娠早期的恶心呕吐和厌食，可能是为了限制孕妇的食物，目的在于使胎儿接触毒素的机会减少到最小。”（尼斯 & 威廉斯，1994：88）这期间胚胎的发育还不需要母亲吸收大量的营养。到需要大量营养时，恶心和厌食已经自然消退。但是恶心和呕吐毕竟难受，于是孕妇求助医生，医生研究出了药物，药物服用的结果却是出生了大量的畸形儿。这种情形说明了那一期间的痛苦是必要的，必须尊重、接受和忍耐。

罗伯特·赖特的批判更是直接指向“快乐是生活的最终目的”，他说：

博弈论家设法使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变得简洁，设想了“愉快”、“幸福”、“功利性”来概括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东西，但因此付出了代价。进化心理学可以指出这种错误，人类不是计算工具，而是动物，他们不仅受理智还受其他因素的指引，长久的幸福不可能被设计去追求。（赖特，1994：175）

其他的动物的行为又是如何的呢？乔治·威廉斯在其代表作《适应与自然选择》中讲述了鲑鱼悲壮的生殖过程：

由于对生殖成功的过度强调以至于损害了双亲的身体。它们中的某些承担了最长的迁移过程，已知的有鲑鱼和所有溯河性鱼群。在准备产卵的过程中，消化系统会萎缩以至于使得以后的生存不再可能。但是这种萎缩却为配子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并且还卸去了鱼的多余的重量，因为在它的溯流旅行中，这种负担对于单纯的生殖功能来说是不必要的，雄性鱼的口部也经历了变化，这种变化有助于在争夺雌性的战斗中取胜，但是却不利于它有效地去完成摄食的功能。（威廉斯，1962：138）

似乎可以认为，自然选择筛选出来的这种机制为了繁衍后代连母体的生命都准备牺牲，快乐在其机制中应该算不上惟一和最重要的追求。

当代生物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电极放在三只老鼠的下脑丘，老鼠面前放置三个杠杆，压第一个杠杆释放食物，压第二个释放饮料，压第三个释放迅速而短暂的快感，老鼠很快分辨出三个杠杆并只选择第三个，直到饿

死。(布兰德, 1995: 350) 这实验告诉我们, 一味沉溺对快乐的追求将带来灭顶之灾。读者可能会说, 这实验不恰恰说明动物的行为完全是追求快乐吗? 不错。但是首先要说这是人为制造的环境, 在此环境中它因追求快乐而死亡, 如果这种环境持续下去, 只有当一只不一味追求快乐的老鼠出现时, 才会走出死亡开始繁衍, 其后代秉承父辈的基因, 也将是不一味追求快乐的老鼠。其次, 在自然的环境中之所以看不到实验中追求快乐致死的动物, 很可能正是因为它们早就被淘汰了。换句话说, 经自然选择存活下来的动物都不是一味追求快乐的。

当代神经学家从其特定的视角发展了进化论的思想。乔治·科布表达了如下的观点:

快乐是一个指导我们行为的奖励系统。但是, 快乐必须有内在的限度。假如一个动物过于沉浸在吃的快乐中, 它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掠食者的猎物。快乐必须足够短暂, 以使我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到下一项任务上。大脑通过两种方式将快乐加以限制……进化使得人不可能有永久的快乐——太多的快乐只会使我们无法专注于基本的生存。(转引自《参考消息》, 2003-12-08, 15版)

讲到快乐哲学, 自然离不开快乐哲学祖师爷边沁的思想。我曾经和主张人的一切行动都是追求快乐的经济学家黄有光辩论, 我说边沁的“快乐清单”是有矛盾的。他的回答是: 他不知道也不管边沁的思想, 捍卫自己的命题就可以了。我惊讶他的无知和褊狭: 怎么可以不关心不学习和自己的思想接近的前辈大师呢! 同时, 思想的逻辑关系又怎么能够划清界限呢? 我当然不认为边沁在哲学史上是属于深刻类型的思想家之列, 但还是要比当代信奉“人的行为都是追求快乐”的经济学家深刻。所以我的批判还是要说说边沁。他曾经给出了一个“简单快乐清单”, 一共 14 种快乐 (Bentham 1970: 42-45)。随便一看就会发现, 其中的内容是有冲突的。比如说, 有“感观的快乐”, 有“财富的快乐”, 但是还有“行善的快乐”、“声誉的快乐”。感观的快乐、财富的快乐很好理解。而追求声誉, 比如一个战士的荣誉, 为了这个荣誉有时要牺牲感观的快乐, 乃至生命; 而行善有时是要牺牲个人的物质享受

的。如果说前面的是快乐，就不能说后面的也是快乐。因为这两者在很多时候是冲突的。要么是这个快乐哲学忽视了人生的丰富和复杂，要么是把丰富和复杂的生活给简化了。把不同品质的东西放在一个篮子里，贴上一个标签——快乐，无助于深入的分析。中世纪哲学家奥卡姆提出的思想的简洁之美，几乎成为以后所有思想者的追求，即努力将自己庞大的思想体系建在一个支点——一个简洁单一的命题上。思想者的这种追求之所以难乎其难，就在于不可以曲解极其复杂的世界和人生，如此获得的美妙的命题是没有意义的。其实，边沁的思想也并不简洁。他没有完成“万流归一”。他用14种快乐来补充他所强调的人类的单一追求——快乐，即“1—14—人类的千百行为”。这简洁的“1”其实是虚假的，只是“1—14”中的前项。还不如用三种追求取而代之呢——这正是我的思想路径。

粗通哲学史的人（笔者也属于这一群体）都知道，边沁与穆勒父子都不是倡导感官和物质享乐的人，他们都是很高尚的人。但是我以为，正是因为其“快乐”中的矛盾，企图以“快乐”包容“无限”的失败，导致他们的“快乐”的含义很少被人们接受。换句话说，边沁等人提出的是“大快乐”的观念，但是尽管他们的哲学问世已经二百年，即使不是多数人也是相当数量的人，在谈到“快乐”的时候，使用的仍是狭义的“快乐”的含义，至少不包括边沁所说的“行善”、“声誉”。我们自下而上举例说明。“享乐主义”无疑是个大众词汇。享乐就是享受快乐，其词义本身绝对没有收缩为“享受感官快乐”。但是当大众们说到“享乐主义”的时候，包含了边沁快乐中的“行善”和为“声誉”奋斗了吗？绝对没有。再看政治精英。法国一位政治家（好像是蓬皮杜）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只有傻瓜才追求快乐。这快乐里面包括“声誉”和“行善”吗？不可能。再看科学家。我们前面说过的生物学家认为“自然选择没有造就人类和动物追求快乐”中的“快乐”也显然是“小快乐”，如果是“大快乐”，他们的论证很难完成。最后看哲学家，也就是边沁的同人。正是哲学家将边沁和穆勒的快乐哲学称为“功利主义哲学”。不错，这功利当然不限于个人功利。但是功利显然更容易和“小快乐”而非“声誉”、“行善”结合。综上所述，边沁等人企图将很多东西注入到快乐之